

文化 溯源

周口有个“三道沟”

王美荣

“三道沟”并非周口街名,而是老周口一个群众居住区的称谓,它同“五间楼”“花井台”和“大椿树”等等一样是群众叫惯了的地方名,位于周口中心城区文化街三中北侧沙颍河堤岸。原来从堤岸直下河边,有三道宽大的滑沟,很像排水沟,但不是用来排水的,人们便把那个地方形象地称为“三道沟”。

明朝初年,周口形成墟集时,陆陈(稻、梁、菽、麦、黍、稷六个粮食品种在商业上的总称)行业便同时兴起,当时,粮食买卖只不过是附近农民的零星交易。明朝嘉靖年间,疏通了河道,开辟了漕运,大批粮船由淮入沙颍河,再转贾鲁河,经汴水过黄河直抵京都。周口正处运河要冲,商业迅速发展,陆陈市场日趋兴旺。至清朝康熙、乾隆时期,周口已成为河南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之一,经营粮食交易的大型粮店就有28家、小型粮坊110余家,从业人员1300余名,几

乎家家每天都有四面八方来的客商,每年粮食成交量两亿多斤,这些粮食多半是通过费用很低的漕运进出。因此,周口的沙颍河、贾鲁河常常船舶如梭、帆樯如林,工人们日夜装卸,繁华如闹市。

粮食下河装船必经渡口(或称埠口),原来周口只有五六个渡口,后来发展到20个。为了存储装卸方便,河南岸的澡塘胡同、康家胡同和关帝庙门等处的许多民房都被租赁,作为储粮的“上房”。在“三道沟”附近还有4个晒麦、装包的麦场。

周口专业从事粮食搬运的有五六个班子,从业人员近千名。装船时,他们用木制独轮车(红车子),每车装4袋,将粮食从“上房”运至堤岸,再抬下河装船。两人抬着1包200斤重的粮食,从堤岸下河装船,需走200多米的路,其中码头阶梯有50多米长,既费力,效率又低。于是,工

人们便想出一种省时又省力的办法,即顺着河坡开一宽1米、深0.7米的沟子,用砖砌成滑沟,沟上口是堤岸,下口接近水面。装粮时,船舶停在对岸滑沟的岸边,滑沟的下口与船之间再搭一条宽宽的桥板。操作时,工人在堤岸将粮食包从山口放入滑沟,一瞬间粮食包便能滑到船上,再由工人抬入船舱,每包只需一二十秒钟就能装船,这样既省时间又省力气,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像这样的滑沟先后开发了三条,这就是“三道沟”的来历。“三道沟”越叫越响,久而久之,群众便将它作为一个地名叫开了。辛亥革命后,周口的陆陈市场逐渐萧条,对“三道沟”的利用也少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由于年年防汛,安全起见,在整修堤岸时将“三道沟”废除了,但是它的名字却流传了下来,至今,老周口人仍把那个地方称为“三道沟”。

红色 故事

姜鸿起之名寻踪

姜新生

1942年4月5日,《拂晓报》第300期《行军》一文署名姜心启。

姜鸿起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写着:姜洪启(起)同志于1948年6月在河南省扶沟县小何庄战斗中壮烈牺牲,1952年3月7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。

2014年7月3日,姜一平从北京市昌平区寄来的姜鸿起赠给弟弟姜鸿瑶、姜鸿瑶传给儿子姜一平的照片——“拂晓报社全体人员合影”的背后对应标注了姜心启、姜洪启两个名字。“姜心启”三字与《拂晓报》上的署名一模一样,均为繁体“启”字。“洪启”二字则与姜鸿起革命烈士证明书上名字相同,区别为一个繁体字,一个是简体字。姜鸿起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亦说明姜鸿起牺牲时使用名为姜洪启、姜洪起。

彭雪枫将军与拂晓报社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,在与彭雪枫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大都刊登,但是仅有《抗战在淮北》第四辑刊登的照片中10人的姓名被标注。姜鸿起下方注记的姓名为姜心启,是该书出版后发现原标注有误,又作改正后印签贴上去的。我请了十多位同事辨别,争议较多,为了确认无误,我又请了解放军画报社、国家安全部的有关专家指正,确认站在彭雪枫将军左边的人即是姜心启。

《走向拂晓》一书中6次出现姜心启这个名字,该书作者单斐是拂晓报社“三元老”之一,他应是姜心启的第一佐证人。1988年10月,拂晓报社编

辑部出版《<拂晓报>创刊五十周年纪念集》,该书第5页刊登的照片,姜鸿起下方注记的姓名为姜心启。与《拂晓报》相关的图书《豫皖苏边区文艺史料选编》《抗战在淮北》等20余部,累计600多万字。这些书籍的作者都是当事人,或者是研究《抗战在淮北》和《拂晓报》的专家、学者。他们的书中凡与姜鸿起有关的表述均为姜心启,一字不差,从未出现周口市、扶沟县等地方文献记载的“姜洪启”“姜洪起”“姜红启”“姜红旗”“姜红琪”“姜洪起”等名字。

扶沟县文联原主席唐贵知著《小何庄壮烈战歌》一书记载:姜鸿起任新四军四师《拂晓报》编辑、记者、营教导员。

根据以上几点推论,姜心启应是姜鸿起。

姜鸿起的“鸿”字是唐贵知先生经过反复论证的。他认为扶沟县等地方文献使用的“红旗”“洪启”“红启”“红旗”“洪起”等应为“鸿起”。

据《<拂晓报>史话》等记载,彭雪枫将军曾数次夸赞姜鸿起,这在彭将军与《拂晓报》编辑部的唯一合影中再次得到印证:姜鸿起站在彭雪枫将军的身旁,而拂晓报社社长王少庸则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外边,其排序超出“常规”。从姜鸿起与彭将军“保持距离”“站姿”,可以看出姜鸿起“有点不好意思”,亦能觉察出其“受宠若惊”的表情,可以充分说明彭将军特别厚爱姜鸿起。没有这种厚爱,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。

在革命战争年代,出于种种需要,更名是常有

的事,谭友林在回忆《一代名将彭雪枫》(《解放军报》1984年9月9日)的文章中说,彭将军曾为自己更名:“有一天,雪枫同志说:‘你名儿里这个有字意思不深,改成友字吧,友是友好、亲近的意思。愿你的战友和朋友像森林中的树木那样众多。’从那以后,我就更名为‘谭友林’了。”

1938年8月,姜鸿起被彭雪枫推荐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深造,毕业后又被彭雪枫安排在拂晓报社工作,姜鸿起更名为姜心启,且很有可能是彭雪枫为其更名。

人取名字,总是代表一种愿望、志向和意趣。姜鸿起在新四军四师《拂晓报》工作期间使用姜心启的名字,耐人寻味。众所周知,报纸的主旨在于教育人、启迪人、凝聚人心。参加革命后的姜鸿起取名姜心启,在现有参考中无答案。我想大概有两层用意:一是在党的教育下,心灵受到启迪投身革命。二是要以报纸为阵地,用心去启发、教育民众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。心者,思想也;启者,开导也。

斯人已逝,我只是依据姜鸿起高昂的战斗热情、一丝不苟地在党的新闻战线上拼搏,夜以继日、兢兢业业奋战在《拂晓报》一版版面的编辑、校对、刻印等具体工作中来猜测,他的平凡伟大精神不是延续了“心启”的蕴意吗?博学多才的彭雪枫赞誉“《拂晓报》胜过千军万马”“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毛瑟枪”,给意志坚定、才华出众、他亦爱之心切的姜鸿起取“心启”之名,也不是没有可能的,在这里录以备考吧。